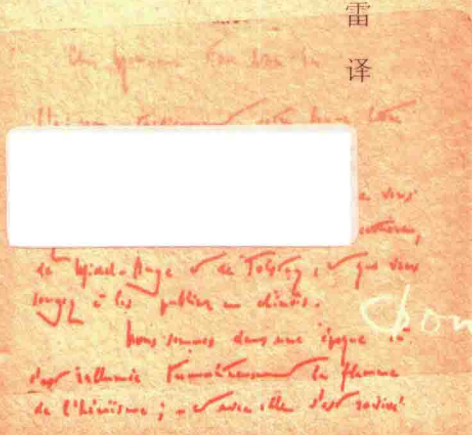


罗曼·罗兰等著
傅雷译

傅译传记五种



罗曼·罗兰 等著
傅雷 译

傅译传记五种

Copyright ©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傅译传记五种 / (法) 罗曼·罗兰等著; 傅雷译. —北京: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6.11
ISBN 978-7-108-05818-8

I. ①傅… II. ①罗… ②傅… III. ①名人-列传-世界
IV. ①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0835 号

傅译传记五种

责任编辑 王 竞 张静芳
装帧设计 蔡立国
责任校对 曹忠零 张国荣
责任印制 徐 方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7.75 印张 429,000 字
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0,001-6,000 册
定价 68.00 元

刊 行 者
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
网址: www.sdxjpc.com

印 刷 者
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
新华书店
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
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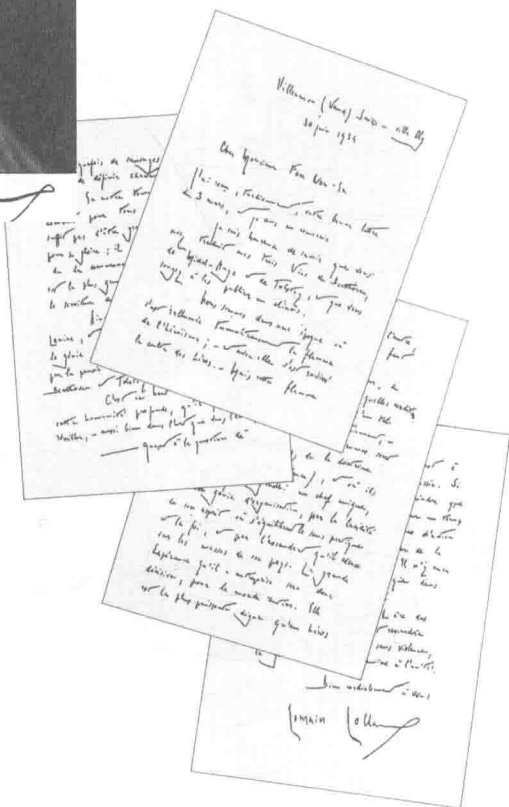


初读《贝多芬传》时的傅雷（一九二九年）



罗曼·罗兰回复傅雷的信（附赠照片）
（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）

Romain Rolland





《夏洛外传》一九三三年九月初版书影



《贝多芬传》一九四六年四月初版书影



《傅译传记五种》一九八三年
十一月初版书影

出版说明

三联书店出版傅雷先生的著译作品始于1945年。那年傅雷完成了他的译作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皇皇四册，由生活书店的分支上海骆驼书店出版，随后又出版了他翻译的《高老头》《贝多芬传》等。解放后，根据上级安排，傅雷翻译的文学作品移交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改革开放后，傅聪第一次回国时，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范用了解到，傅雷生前曾写给傅聪百余封长信，内容很精彩，即动员他和弟弟傅敏把这批信整理发表，后摘录编成一集，约十五万字，名为《傅雷家书》。彼时，傅聪50年代出国不归的事情还没有结论，但范用认为：“出版一本傅雷的家书集，在政治上应不成问题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，也是落实政策，在国内外会有好的影响。”范用还说，这本书对年轻人、老年人都有益处（怎样做父亲，怎样做儿子），三联书店出这样的书，很合适。

《傅雷家书》于1981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，广受好评，持续畅销，至2000年销售达一百一十六万册，并获得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（1986），入选“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”（1999）。《傅雷书信选》即在“家书”的基础上，加入一组“给朋友的信”，而这些给朋友的信，也大多是谈论傅聪的（如给傅聪岳父、著名音乐家梅纽因的信，给傅聪的钢琴老师杰维茨基的信等），因而从另

一个角度丰富了“父亲”和“儿子”的形象，可以说是对“家书”的一个补充。

80年代，三联书店还相继出版过《傅译传记五种》（1983）和《人生五大问题》（1986），均受到读者的欢迎。前者收入了傅雷翻译的罗曼·罗兰《贝多芬传》《弥盖朗琪罗传》《托尔斯泰传》，莫罗阿《服尔德传》以及菲列伯·苏卜《夏洛外传》，借他们克服苦难的故事，让我们“呼吸英雄气息”，由钱锺书题写书名，杨绛作序。后者原名《情操与习尚》，是阐述人生和幸福的五个演讲，1936年经傅雷定名为《人生五大问题》初版，80年代三联书店在“文化生活译丛”中推出；傅雷曾经将它与莫氏的《恋爱与牺牲》一起，推荐给年轻的傅聪和弥拉阅读。此次合为一册，一齐呈现给读者，以“明智”为旨，“高明的读者自己会领悟”。

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是傅雷于30年代写的美术讲义，1979年“从故纸堆里”被发现后，由三联书店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甲丰加以校订、配图，于1985年推出；1998年复推出彩色插图版。《艺术哲学》是傅雷精心翻译的艺术史通论，“采用的不是一般教科书的形式，而是以渊博精深之见解指出艺术发展的主要潮流”，彼时，傅雷忍着腰酸背痛、眼花流泪，每天抄录一部分译文，寄给傅聪；其情殷殷，其书精妙。

作为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和高明的艺术评论家，傅雷早年对张爱玲的评价和中年对黄宾虹的评价均独具慧眼，为后世所证明；他对音乐的评论更是深入幽微，成大家之言，《与傅聪谈音乐》（1984）曾辑录了部分精彩文字。我们特邀请傅敏增编了傅雷的艺术评论集，并从信札中精选出相关内容，辑为“文学手札”“翻译

手札”“美术手札”“音乐手札”附于其后，名之为《傅雷谈艺录》，展示一位严谨学者一生的治学经验，相信同样会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今年，傅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，我们特别推出三联纪念版傅雷作品，以此纪念傅雷先生，以及那些像他一样“又热烈又恬静、又深刻又朴素、又温柔又高傲、又微妙又率直”的灵魂。



三联纪念版《傅译传记五种》以1983年的初版为底本，其中有些标点和字词（如“发见”“那末”“的”“地”）的用法与现在的规范有所不同，均未作改动，以存原貌。

书中的一些译名，与现行通用译名亦有不同，如“卓别麟”今译为“卓别林”，“弥盖朗琪罗”今译为“米开朗琪罗”，“服尔德”今译为“伏尔泰”，“翡冷翠”今译为“佛罗伦萨”，“佛尼市”今译为“威尼斯”。因傅雷先生对译名的选择有自己的考虑，所以本书保留傅译原名。同时，为了方便今日读者阅读，在常见人名、地名、作品名首次出现时，以括号内加楷体的形式，标注出通用译名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

2016年6月

代序

杨绛

我先要向读者道歉，我实在没有资格写这篇序。因为我对于这几部传记的作者，以及传记里的人物，毫无研究；也缺乏分别精华和糟粕的能力，不会自信地指出该吸收什么、摒弃什么。但傅敏要我为他爸爸所译的传记作序。我出于对傅雷的友谊，没有推辞。这里，我只简约地介绍这五种传记，并介绍我所认识的这位译者。

传记五种，作者只三人。

《夏洛外传》里的夏洛，是虚构的人物——电影明星卓别麟（卓别林）的艺术创造。夏洛是一个追寻理想的流浪者；他的手杖代表尊严，胡须表示骄傲，一对破靴象征人世间沉重的烦恼。有一位早期达达派作者以小说的体裁、童话的情趣，写了这部幻想人物的传。译者在他所处的那个“哭笑不得的时代”，介绍了这么一个令人笑、更令人哭的人物，同时也介绍了卓别麟的艺术。^①

^① 参看《夏洛外传》卷头语及译者序。

《贝多芬传》《弥盖朗琪罗传》《托尔斯泰传》同出罗曼·罗兰之手。传记里的三人，虽然一是音乐家，一是雕塑家兼画家，一是小说家，各有自己的园地，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伟大的天才，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，为寻求真理和正义，为创造能表现真、善、美的不朽杰作，献出了毕生精力。他们或由病痛的折磨，或由遭遇的悲惨，或由内心的惶惑矛盾，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，深重的苦恼，几乎窒息了呼吸，毁灭了理智。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，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、对人类的信心。贝多芬供大家享乐的音乐，是他“用痛苦换来的欢乐”。弥盖朗琪罗（米开朗琪罗）留给后世的不朽杰作，是他一生血泪的凝聚。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里，描述了万千生灵的渺小与伟大，描述了他们的痛苦和痛苦中得到的和谐，借以播送爱的种子，传达自己的信仰：“一切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”；“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，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”。罗曼·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“英雄”。他所谓英雄，不是通常所称道的英雄人物。那种人凭借强力，在虚荣或个人野心的驱策下，能为人类酿造巨大的灾害。罗曼·罗兰所指的英雄，只不过是“人类的忠仆”，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；他们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能倾心为公众服务。

罗曼·罗兰认为在这个腐朽的社会上、鄙俗的环境里，稍有理想而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人，日常都在和周围的压力抗争。但他们彼此间隔，不能互相呼应，互相安慰和支援。他要向一切为真理、为正义奋斗的志士发一声喊：“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军！”他要打破时代的间隔和国界的间隔——当然，他也泯灭了阶级的

间隔，号召“英雄”们汲取前辈“英雄”的勇力，结成一支共同奋斗的队伍。^①

《服尔德传》的情调，和以上三部传记不同。作者莫罗阿说，服尔德（伏尔泰）“一生全是热烈轻快的节奏”。但服尔德观察过人类的生活；他自己也生活过、奋斗过、受过苦，并看到旁人受苦。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疯狂而残酷的，人的智慧却很有限；可是他主张每个人应当有所作为，干他力所能及的事。“一切都是不良的，但一切都可改善”。他为了卫护真理和正义，打击愚蠢和懦怯，常不顾个人利害，奋起斗争。他那些轰轰烈烈的作为，很能振奋人心。^②

读了这五种传记，见到了传记里的人物，对他们的作品能加深理解和鉴赏的能力，同时对传记的作者也会有所认识，不必我喋喋多言。可是传记的译者呢，除了偶一流露他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意念，始终隐而不见。而这五部传记的译文里，渗透着译者的思想感情。他辅助传记作者“打开窗子”，让我们都来“呼吸英雄气息”。我想，读者或许也愿意见见我们的译者傅雷吧？

傅雷广交游。他的朋友如楼适夷、柯灵等同志，已经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。我只凭自己的一点认识，在别人遗留的空白上添补几笔。

抗战末期、胜利前夕，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。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，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。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，日子不好过，真不知“长

① 以上两节的引文，都出于本书的本文和原序。

② 参看服尔德《刚第特》（《老实人》）和传记本文。

夜漫漫何时旦”。但我们还年轻，有的是希望和信心，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，就想看到云开日出。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，就好比开开窗子，通通空气，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。到如今，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，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。

说起傅雷，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。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。我闭上眼，最先浮现在眼前的，却是个含笑的傅雷。他两手捧着个烟斗，待要放到嘴里去抽，又拿出来，眼里是笑，嘴边是笑，满脸是笑。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、坐在他对面的时候，他听着锺书说话，经常是这副笑容。傅雷只是不轻易笑；可是他笑的时候，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，觉得津津有味。

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。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。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，西禾急得满面尴尬，直向锺书递眼色；事后他犹有余悸，怪锺书“胡闹”。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。他带几分不好意思，随着大家笑了；傅雷还是有幽默的。

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，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。他自己可以笑，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。在他的孩子面前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。阿聪、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，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。大人说的话，也许孩子不宜听，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。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。有一次，客厅里谈得热闹，阵阵笑声，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。忽然他灵机一动，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，把门一开。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，正缩着脖子笑呢。傅雷一声呵斥，两孩子在登登

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。梅馥忙也赶了上去。在傅雷前，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；在儿子前，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，自己温言告诫。等他们俩回来，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。但过了一会，在笑声中，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，阿聪、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。这回傅雷可冒火了，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。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，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；一个孩子想是哭了，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。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，只装作不闻不知，坐着扯淡。傅雷回客厅来，脸都气青了。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，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，不免叹口气：“唉，傅雷就是这样！”

阿聪前年回国探亲，锺书正在国外访问。阿聪对我说：“啊呀！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！”去年他到我家来，不复是顽童偷听，而是做座上客“听钱伯伯说话”，高兴得哈哈大笑。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，凄然回忆往事，慨叹说：“唉——那时候——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。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，正因为爱他深。他告诉我：“爸爸打得我真痛啊！”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，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。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。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，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，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，又增添自己的苦痛。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，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；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相似，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，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。阿聪只叫得一声“姆妈”，妈妈只叫得一声“阿聪”，彼此失声痛哭，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，电话早断了。这是母子末

一次通话——话，尽在不言中，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，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。

有人说傅雷“孤傲如云间鹤”；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“墙洞里的小老鼠”——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”呢？傅雷的自比，乍听未免滑稽。梅馥称傅雷为“老傅”；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：那是“老傅”还是“老虎”，因为据他们的乡音，“傅”和“虎”没有分别，而我记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。他却自比为“小老鼠”！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，也不是谦虚。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。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。但众多的朋友里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。误会、偏见、忌刻、骄矜，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。傅雷曾告诉我们：某某“朋友”昨天还在他家吃饭，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。这种事不止一遭。傅雷讲起的时候，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，嘴角上挂着讥诮，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、世情险恶，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，孤弱得无以自卫。他满头棱角，动不动会触犯人；又加脾气急躁，制不住要冲撞人。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，他可以安身的“洞穴”，只是自己的书斋；他也像老鼠那样，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。他并不像天上的鹤，翘首云外，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。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，可是他也许遵循《刚第特》的教训吧？只潜身书斋，做他的翻译工作。

傅雷爱吃硬饭。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、干爽；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，他全让给梅馥了。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，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，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。他有事

和锺书商量，尽管讨论得很热烈，他并不固执。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《新语》，尽管这种事锺书毫无经验，他也不摒弃外行的意见。他有些朋友（包括我们俩）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，不善适应社会。傅雷从谏如流，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。锺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，他就临什么字帖；锺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，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，并用草书抄稿子。

解放后，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。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，道过天津。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、马叙伦二老，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。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，央我们夫妇做说客。但傅雷不愿教法语，只愿教美术史。从前在上海的时候，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，锺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：Critique d'Art（美术批评家）。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。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，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。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，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，傅雷决计仍回上海，干他的翻译工作。

我只看到傅雷和锺书闹过一次别扭。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，傅雷未能到会，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，讨论翻译问题。讨论翻译，必须举出实例，才能说明问题。傅雷信手拈来，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；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。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；他拈出例句，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。这就触怒了许多人，都大骂傅雷狂傲；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。平心说，把西方文字译成中